

王新生◎著

这是一段永远让人记忆的历史。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的日子里，项英、陈毅受命于危难之中，率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干部和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红膏不倒，在与火的考验中，上演了一场游击战争奇观，燃遍油山，雄浑梅关见证了这一切的一切……

# 陈毅与项英

中共党史出版社

陈毅与  
项英

王新生◎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毅与项英/王新生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199—628—2

I. 陈… II. 王… III. 南方游击队—游击战争—史料  
IV.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411 号

## 书 名: 陈 毅 与 项 英

---

作 者:王新生

责任编辑:韩冬梅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2mm×235mm 1/16

字 数:233 千字

印 张:16.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28—2

定 价: 28.00 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陈毅与  
项英

# 陈毅与 项英

责任编辑：韩冬梅

责任校对：龚秀华

版式设计：俞水清

封面设计：安 宁

责任印制：谷智宇

# 目 录

## 第一章 临危受命 /1

- 一、萧瑟秋风 /1
- 二、项、陈携手 /10
- 三、策应主力转移 /19
- 四、黑云压城 /24

## 第二章 战略转变 /28

- 一、准备突围 /28
- 二、中央来电 /33
- 三、杀开血路 /40

## 第三章 油山红旗 / 50

- 一、挺进油山 /50
- 二、艰难会合 /58
- 三、重振雄风 /68

## 第四章 打破“清剿” /77

- 一、奇袭乌径 /77

二、再胜游仙圩、钨矿山 / 82

三、照单收货 / 85

四、敌变我变 / 91

## 第五章 巩固内部 / 98

一、北山事件 / 98

二、将心比心 / 111

三、思想教育 / 118

## 第六章 岁寒松柏 / 125

一、反封坑斗争 / 125

二、风餐露宿 / 134

三、亲密无间 / 138

## 第七章 军民鱼水 / 149

一、人民支援 / 149

二、彭坑情深 / 152

三、舍命保红军 / 158

## 第八章 扩大新区 / 164

一、积极出击 / 164

二、“白皮红心” / 174

三、“黄色村庄” / 179

四、两面政权 / 182

## 第九章 艰难时刻 / 187

一、风云突变 / 187

二、与敌周旋 / 190

三、梅岭风云 / 194

## 第十章 曲折谈判 / 206

一、历史新阶段 / 206

二、大庾谈判 / 213

三、赣州舌战 / 216

四、南昌交锋 / 220

## 第十一章 改编、出征 / 223

一、部署集中 / 223

二、项英北上 / 230

三、奔走湘赣 / 236

四、开赴前线 / 246

## 后 记 / 255

# 第一章 临危受命

## 一、萧瑟秋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余人在瑟瑟秋风之中，迈着沉重的步履，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漫漫战略转移征程。留在苏区内的项英、陈毅等，率领留在根据地内的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也是青史永垂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为什么要撤离创建多年的根据地和难舍难分的群众，还要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

一年前，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对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时年47岁。从1930年冬起至1933年春，他连续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中央红军粉碎了。面对失败，蒋介石学乖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对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做了充分的准备，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军事上，废弃了前四次“围剿”红军实行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作战方针，改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此外，蒋介石还聘请了一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拟订作战计划；



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

并向美国、英国贷款,购置飞机、大炮等新式装备。为了培养军事骨干力量,从1933年7月至9月在江西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人。蒋介石为了摧毁中央苏区,扑灭正以燎原之势点燃的革命烈火,不能不说是费尽了心机!

中央苏区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后,中央红军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尽管蒋

介石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长避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仍然是可能的。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3年初,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不能够立足,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这不能不说是中央苏区的一场灾难。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时年26岁。博古原名叫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24日生于一书香门第之家。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秦邦宪被党派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中山大学的規定,每一个入学的留学生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名

Богунов,中文译音就是“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做化名。这便是“博古”的由来。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与王明过从甚密,并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这段经历,是博古后来成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主要阶梯。1931年1月,米夫控制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并实际上操纵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到半年的博古升任团中央书记。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叛变。这两个人叛变后,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组织接连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胆小如鼠的王明,先后到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和一个尼姑庵躲避了一阵。这时,王明深感躲避也不是长久的办法,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因被共产国际指责在“立三路线”问题上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被撤职后,这个职务一直空缺,王明认为这是个脱离险境的好机会,便征得共产国际同意,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年仅24岁的博古,就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

对于博古来说,临时中央这副担子压在他的消瘦的肩上无疑是太沉重了!他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前主要经历是学生,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他在莫斯科读了三年半的书,1930年5月回国,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同时参加工人报纸《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假如,博古从这个基层岗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下去,实际工作经验加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那么,他会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的。然而,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揠苗助长”和复杂的历史原因,将这个24岁的青年,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的宣传干事推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把手的位置。这就铸成了博古的悲剧,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日后的革命

斗争中遭受严重挫折。

王明在赴莫斯科前,曾给博古留下“秘诀”: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别人。博古牢记这个秘诀,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尤其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仅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就遭到三次的破坏,1933年又遭到第四次破坏;中共山东省委从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连续遭到五次大破坏;赤色工会会员到1932年1月剩下不足3000人。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打击、排斥中央苏区的创建者毛泽东。1933年5月12日,博古被增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于博古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大权。博古本人对军事一窍不通,在蒋介石大力准备第五次军事“围剿”时,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



博古

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福建作战,企图在两战略方向上同时取得胜利,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红军正确的战略战术是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破敌人的计划,只能是徒然分散红军的兵力,使红军陷于被动局面。博古等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结果是东方军在福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

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却没有什仗可打,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红一方面军由此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博古轻视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他主持下,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7月24日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要胜利。”“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决议还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论断,号召“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些冒险主义的口号确实能在一时鼓舞人心,让中央苏区根据地军民认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革命要不了几天就胜利了。

1933年9月下旬,经过充分准备的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北路军进攻黎川。9月28日,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黎川。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人物到达中央苏区。此人名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年1月29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区的伊斯玛宁镇。1918年,18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列兵。1919年,李德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后曾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李德被魏玛共和国指控为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和监禁。1928年,李德从柏林莫阿比监狱成功越狱,秘密进入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不久,他又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该校的高才生。毕业后,李德曾短期任过苏联某骑兵师参谋长。1932年春,李德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在华期间,曾以“华夫”的化名在中国共产党的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因此,中国党内又称李德为“华夫同志”。

李德的到来,使博古欣喜不已。在欢迎李德的会上,博古称李德为

“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并决定李德可以列席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和决策的研究和制定，负有指导和监督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重任。

李德是个大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比较显眼，为了保密起见，在这次欢迎会上，博古还要求大家一律用中文称呼“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也是为了保密，中共临时中央为李德准备了一所单独的房子，房子周围都是稻田，正屋三间，中间是堂屋，用来做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图。东边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边一间是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处。博古要李德尽量躲在房子里，不让别人发现。这样，李德就躲在这个“独立房子”里，面对地图，开始了在中央苏区纸上谈兵生涯。

从李德到中央苏区来之前的经历看，确实是以军事为主，既当过士兵，又任过高级指挥员；既有正规战场的前线实战经验，又有参加中心城市起义的街垒战体验，还在军事学院学过系统的军事理论，不细琢磨的情况下，博古让他指挥红军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李德虽然懂军事，但都是西方的正规战、阵地战、街垒战，而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同西方的军事作战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执掌着全国政权，不但在兵力上又占绝对优势，而且装备、军需物资等也占绝对优势；红军弱小，地处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军事装备简陋，军需物资贫乏。因此，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只能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而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地打阵地战、消耗战。可以说，李德的阵地战、街垒战经验，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是无用武之地的。博古将过去毛泽东等的有效战略战术弃之不用，依靠李德来指挥反“围剿”斗争，寄希望于李德的苏联红军正规战经验，在一开始就注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李德一上任，就急于恢复黎川，强令红军主力反击。红军主力在洵口与国民党军遭遇，打了一个胜仗。于是，博古、李德便飘飘然，贸然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两个月，不仅没能在敌占区或敌我

交界地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 and 堡垒之间,吃尽苦头,消耗很大,陷于被动。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接连遭受挫折后,博古、李德即由刚开始时的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短促突击”作为主要战术,命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英、美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蒋在南昌暗喜。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有利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事件——福建事变。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上海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后,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公开宣布抗日反蒋。1933年10月26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派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中央苏区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

福建事变,可以说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都认为,红军应出击,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采取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了他们的意见,要红军继续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由于没有在军事上给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配合,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红军也由此而丧失了一次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绝佳战机。

蒋介石在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陈济棠部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博古、李德手忙脚乱,指挥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人的堡垒阵地发动

进攻,同敌人继续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国民党军进攻广昌,企图从中间突破,挺进中央苏区的中心,诱使红军主力与其决战。博古、李德果然中计,组织红军主力,与敌“决战”。

博古、李德在广昌保卫战上下了极大的赌注,认为此战若胜,反“围剿”胜利就不成问题,因此铆足了劲,投入了九个师的兵力作战。然而,事实是残酷无情的。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虽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5。红军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处于敌人的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而国民党军东路军却乘红军主力在广昌作战的机会,攻占了泰宁西部重镇梅口。无奈之下,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



李德

广昌战役的失利,引起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广昌战役刚结束不久,耿直的彭德怀就尖锐地批评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在后方的毛泽东听说广昌战役失利后,叹了口气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就连支持过“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认为广昌之战同敌人死打硬拼,只能使红军白白遭受损失,这种蛮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李德本想通过广昌战役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没想到撞

了一头疙瘩,对红军在中央苏区内取得反“围剿”胜利也失去了信心。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也是议题之一。李德在会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但是,对于李德的建议,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最后会议形成了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另一种是将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6月初,上述两种方案由共产国际远东局转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6月16日回电,认为中央苏区还没有到支持不下去的地步,如果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利用秋季国民党发动总攻之前的夏季这段时间,是能够扭转战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若反“围剿”斗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红军主力可以进行战略转移,但眼前不必投入全部精力做准备工作,只需做些筹备粮食工作。

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即继续打下去,红军主力是否转移,要看夏季以后的战局了。共产国际这个决策严重脱离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实际。它一方面对中央苏区整体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另一方面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能力作了过高的估计,从而铸成大错。

博古、李德接到共产国际6月16日电报指示后,立即贯彻执行,先后于7月上旬和下旬派红七军团经福建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及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西征到湖南中部,希望两支红军开辟新的战略区,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的兵力,迫使其改变战略和作战部署,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从而扭转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局面。然而,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相继出征后,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吸引敌人的兵力有限,中央苏区更加困难。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人力、物力已经很匮乏,红军已无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于是,中共中央开始部署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